

史念海 主编

唐史论丛

第五辑

三秦出版社

唐史论丛

第五辑

史念海 主编

三秦出版社

《唐史论丛》

第五辑

史念海主编

三秦出版社出版

(西安湘子庙街12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9.625印张 2插页 240千字

1990年7月出版 1990年7月西安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

ISBN7-80546-158-9/K·59

定价4.80元

目 录

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

人为作用的关系·····	史念海 (1)
唐代和畝制度的性质及作用·····	赵文润 (23)
唐代均田制与日本班田制下的劳动者·····	牛致功 (33)
唐代宦官·····	牛志平 (50)
武周宰相数目考·····	王双怀 (97)
唐代藩镇分类刍议·····	王援朝 (106)
神策中尉与神策军·····	贾宪保 (130)
论牛李党争·····	毛双民 (155)
简论李晟·····	齐勇锋 (179)
李德裕·····	田廷柱 (189)
高骈史事考辨·····	孙永如 (208)
唐人楷书述论·····	黄永年 (223)
敦煌写本《玄言新记明老部》残卷研究·····	李斌城 (238)
《顺宗实录》的作者和详略本问题·····	张艳云 (252)
论人以知世, 转益而出新·····	任世英 (267)
唐代流外官制研究(上)·····	任士英 (276)

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 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

史念海

《隋书·地理志》论述炀帝大业时的疆域，谓“东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旧唐书·地理志》论述玄宗天宝时的疆域，也说：“唐土东至安东府，西至安西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单于府。”幅员的广大皆为前世所少有。这样广大的版图，当时的自然环境如何？隋唐两代如何能够在这里建立它们的王朝？都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世之治史者一般皆置之不论，殆以自然环境不会有很大的变化，观今就可以知古，无容再琐琐道及。殊不知自然环境也时时在变化之中，参以人为力量，当更加速这样的变化。隋唐两代固与其前后各时期不同，就是在其统治的三百多年中，前后亦多未能一致。这虽然没有政治权力变化那样明显易见，却是不能稍加忽视的。现在全国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首推长江下游太湖周围各地，可是隋代及唐代天宝以前，都城所需的漕粮却主要来自太行山东和黄河下游各地，这就不能用现代的现象作解释了。因此，对于隋唐时期全国的自然环境及其变化加以说明，对于研治这一时期的史事也许还不至于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

一 长安附近的水道及灌溉网的形成

隋唐两代皆以长安为都城。都城建在长安，不仅有其地理的

因素，更有关于对内对外的策略^①。这里仅就长安周围的水道略事论述。长安城外的八水远在汉代就已有名于世^②。这是指泾、渭、潏、滈、涝、沔、滹、滈八水而言。隋唐时期，潏水虽已湮没，其南的交水可能就是潏水的上源^③。隋时徙长安于龙首原下，本是因汉代故城咸卤，不适于饮用。新都建成后，城内用水主要就是引自八水的交水、潏水和滈水。引水渠道分别是永安渠、清明渠和龙首渠^④。就是长安城东南隅都人士游乐地的曲江，也是由黄渠引义谷水入城的^⑤。隋时在长安城北开凿漕渠，引渭水东入黄河，运输关东粮食^⑥，这条漕渠到唐代还继续维修^⑦。唐代又曾在长安城南开凿漕渠，引潏水入城，以漕南山的薪炭^⑧。然而更重要的则是引水灌溉，促进农业的发展。秦汉以来的郑国渠、白渠和成国渠都得到继续维修，发挥其已有的效益。唐时所

①拙著《中国古都形成的因素》（稿本）。

②《文选》8，司马长卿《上林赋》。

③《水经·渭水注》：“潏水上承潏池于昆明池北”，是潏池为潏水源头。潏池湮塞，潏水也就断流。潏池为一畜水池泊，如何能为潏水源头？昆明池为汉武帝时所凿，池水主要引自交水。在昆明池未开凿前，交水可能就是潏水的上源。

④赵彦卫《云麓漫钞》8。

⑤张礼《游城南记》。

⑥《隋书》24《食货志》。

⑦《旧唐书》172《李石传》，《新唐书》53《食货志》。

⑧《唐会要》87《漕运》：“天宝二年，京兆尹韩朝宗分渭水入金光门，置潭于西市的西街，以贮材木。”《新唐书》37《地理志》同。按：渭水当为潏水之误，见后文注。

谓三辅渠①、郑白渠②和刘公渠③，都是郑国渠和白渠的继续和发展。唐初也曾修治成国渠并曾引武安水，又一再修复六门堰④，都显出一定的成就。就在长安附近还有一条贺兰渠，也称为丰水渠，是引丰水至交水的渠道⑤。又有清渠和漆渠。清渠是由鄠县入于长安，北流入渭。漆渠是分沔河水入于漕河⑥。就是引水入长安城内的诸渠，在供给都城用水之外，也有部分用于灌溉⑦。当时引沔水入城的为龙首渠。龙首渠如此，其他各渠也应都有余水可以灌溉的。如流入曲江的黄渠就有一支流入樊川灌溉稻田的⑧。至于未引入城内各水，当地农民也都是不能轻易放过的。这绕长安城的八水实际上组成了一个相当广大的灌溉网，孳育农田，更增加了长安城作为两代都城的意义。

从这些水道的分布可以显示出如下的一些情况：当时这些水道的流量都比较大，水流也比较清澈，河床也不至于过深。前面说到唐代在长安城南开凿漕渠，引漓水入城，以漕南山的薪炭。这条漕渠前后共开凿过两次，一次在天宝二年（743），是京兆尹韩朝宗开凿的⑨；一次在代宗大历元年（766），是京兆尹黎幹

①《旧唐书》98《李元纁传》。

②《旧唐书》95《宣惠太子业传》，又118《王缙传》。

③《新唐书》37《地理志》。

④宋敏求《长安志》14引《李石记》。

⑤宋敏求《长安志》12引《括地志》。

⑥宋敏求《长安志》12《长安》。

⑦《旧唐书》177《崔琪传附崔瑄传》。

⑧《长安志》11《万年》。

⑨《唐会要》87《漕运》及《新唐书》118《韩思复传附韩朝宗传》，《长安志》12《长安》三书皆谓引渭水入城。渭水和长安城中隔龙首原，是不能引之入城的。后来黎幹开凿的漕渠，正是在韩朝宗漕渠的基础上扩展的。黎干开凿的渠，其源出自南山，非引自渭水。

开凿的①。韩朝宗开渠时，还曾置潭于西市的西街，以贮材木。所贮的材木是用船运来，还是放在水中漂来，尚不可知。黎幹所开的渠主要是运薪炭，这就非船不可。韩朝宗所开的漕渠是分引漓水，分水的地方在万年县南②，当时的清明渠亦引用漓水。清明渠自大安坊东街入城③。大安坊即在安化门内。则清明渠在漕渠之东，它由漓水分水处也当在漕渠分水处的上游。这是说由漓水分出清明渠后，再分出漕渠。漕渠仅有漓水的一部分水量，已经可以行船，则漓水的水量之大，可以知矣。漓河源于南山。由南山流下的其他诸河，也应该如此。当时南山的森林是相当茂密的④。茂密的森林可以涵育水源的。当时由南山流下各水都有相当大的水量，不是没有道理的。由于这些水流都有较大的水量，所以当时的灌溉网是会有充足的水量可以用之灌溉农田的。现在漓河的水流不仅难于行船，甚至还可以徒涉，其他各水夏日往往干涸无水，又怎能组成灌溉网呢？

隋初开凿广通渠以漕运关东的粮食时，隋文帝曾颁布了一封诏书。诏书中说：“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阨。计其途路，数百而已，动移气序，不能往复，泛舟之役，人亦劳止。”⑤渭水多沙，对于航行船只自有一定的影响，但在隋时充其量只是“动移气序，不能往复”，也就是说，船只受到阻阨，延误时日，还不到不能航行的地步。可是到了唐德宗贞元（785至805）初年，长安缺粮，关辅宿兵斗米千钱，太仓供天子和

①《新唐书》37《地理志》，又145《黎幹传》。

②《长安志》11《万年》：“漕水由县界穴河分水。”穴河即穴水，亦即漓水。

③《云麓漫钞》8。

④拙著《河山集二集·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

⑤《隋书》24《食货志》。

六宫的膳食，连十天都难以支持。关东的漕粮积储在华阴的永丰仓，竟难借渭水转运，只好采取陆运的办法，陆运的牛几乎都死完了①。再后到文宗大和（827至835）初年，由于天旱，渭河水小，漕舟只好掇沙而进，在兴成堰未疏成以前，仍然要仰仗陆运，因为需牛过多，影响了关中的农耕②。隋文帝颁布如上诏书是在开皇四年（584）。由那时至德宗贞元元年为191年。由贞元元年至大和元年又为42年。两百年上下，渭河的游沙竟多至这样的程度。长安附近农田灌溉面积的减少，还不至引起过分的注意。经过渭水上运的漕粮不能按时到达，举朝都会为之惶惶不安的。

二 黄河下游富庶地区的变化

隋唐两代皆以长安为都城，长安居于关中富庶的农业地区，产粮自来是有名的。由于都城的设立，人口大量增加，粮食的供应就成了问题。解决的办法是由关东运输漕粮。这在秦汉时期就是如此，到了隋唐时期依然因而未改。秦汉时期关东漕粮的取给主要是在鸿沟系统诸水的上游和济水流域以迄于东海之滨。隋唐时期主要则是在当时的黄河下游及其南北各地。当时的黄河下游流经荣泽（今荣阳县东北）、原武和阳武（今原阳县）、新乡（今新乡县）、汲（今汲县）、酸枣（今延津县西）、灵昌（今滑县西南）、白马（今滑县东）、临河（今濮阳县西）、濮阳（今濮阳县南）、清丰（今清丰县西）、顿丘（今清丰县西南）、鄆城（今鄆城县北）、临黄（今范县南）、朝城（今范县东北）、武水（今聊城县西南）、阳谷（今阳谷县东北）、聊城（今聊城县东北）、高唐（今高唐县）、平阴（今平阴县）、平原（今平原

①《新唐书》53《食货志》。

②《旧唐书》127《李石传》。

县)、安德(今陵县)、长清(今长清县)、临邑(今临邑县南)、滴河(今商河县)、临济(今章丘县北)、邹平(今邹平县北)、厌次(今惠民县南)、蒲台(今滨县东北)等县境^①。这条黄河在现在黄河之北,也在当时济水之北。

《隋书·地理志》以《禹贡》九州的区划论各地的风俗物产。豫州好尚稼穡的有荥阳、梁郡、濮郡、济阴、襄城、颍川、汝南、淮阳、汝阴诸郡。这些诸郡依次是唐代的郑州、宋州、亳州、曹州、汝州、许州、蔡州、陈州、颍州。其治所分别是现在的郑州市、商丘县、安徽亳县、山东定陶县、河南临汝县、许昌市、汝南县、淮阳县、安徽阜阳市。还有冀州的信都、清河、河间、博陵、恒山、赵郡、武安、襄国各郡。这些郡依次是唐代的冀州、贝州、瀛州、定州、恒州、赵州、洺州、邢州。其治所分别是现在河北冀县、清河县、河间县、定县、正定县、赵县、永年县、邢台市。豫州诸郡是在黄河以南,冀州诸郡则在黄河以北。《隋书·地理志》于青州、兖州诸郡无所论列。其实除泰山和沂蒙山区外,远自秦汉以来就已经是富庶的农业地区的一部分,中间没有若何变故,富庶的基础应该还是继续存在的。《隋书·地理志》没有道及,可能是失之疏漏。隋文帝开皇三年(583),也就是在开凿广通渠的前一年,曾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邵、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以漕关东及汾、晋之粟^②。这十三州除蒲、邵两州外,其余皆在今河南省。这十三州的治所依次是永济县、陕县、灵宝县、卢氏县、宜阳县、洛阳市、郑州市、沁阳县、垣曲县、旧淇县、开封市、许昌市和临汝县。这都是运输关东漕粮道路所经过的地方。可见当时长安所需要的漕粮主要是来自关东。开皇三年置募运米丁时,曾提到运汾、晋之

①《元和郡县图志》7、8、10、11、16、17、18各卷。

②《隋书》24《食货志》。

粟。这是指汾水中下游流域。《隋书·地理志》论冀州时，指出汾水流域的河东、绛郡、文城、临汾、龙泉、西河诸郡，土地沃少瘠多，是不能和太行山东诸郡相比拟的。这几个郡分别于唐时为河中府、绛州、吉州、晋州、隰州和汾州。其治所依次为今山西永济县、新绛县、吉县、临汾市、隰县和汾阳县。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裴耀卿主持漕运时，就曾益漕晋、绛、魏、濮、邢、贝、济、博之租^①。这八州除晋、绛二州在汾水流域外，其余皆在黄河下游的南北。邢、贝二州已见前文。魏、濮、济、博四州的治所依次是河北省大名县，山东省鄄城县、庄平县和聊城。

隋唐时期黄河下游的南北，自远古以来就已具有促进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地理因素。已经发现有较为繁多的稠密原始社会的文化遗址，就在夏、商、周三代时，这一地区也显示出其独异的特点^②。经过相当悠久的岁月，这样有利的地理因素，还能有若干遗存。远古时期这一地区湖泊相当众多，虽经过不断的堙塞，存留者仍不在少数。不仅像大陆泽和大野泽这样巨大的湖泊仍未干涸，就是一些州郡中也还有若干较小的湖泊^③。一般说来，富庶的农业地区的土壤都是比较肥沃。远在战国时期，《禹贡》一书就曾论述过各州的土壤。隋唐时期的黄河南北，相当于《禹贡》所划分的兖州全部，豫、冀、青三州的各一部。《禹贡》把所说的九州的土壤分为九等，除黄河上中游的雍州为上上外，兖州为

①《新唐书》53《食货志》。按：裴耀卿主持此事时，方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裴耀卿大拜在开元二十一年，见两《唐书·玄宗纪》及《新唐书·宰相表》。

②拙著《由地理的因素试探远古时期黄河流域文化最为发达的原因》（刊《历史地理》第三辑）。

③《元和郡县图志》有关各卷。

上中，青州为上下，豫州为中上，冀州为中中。可知都是很不错的。隋唐时期没有专门记载土壤的文献，难作比较。《隋书·地理志》论述河东、绛郡、文城、临汾、龙泉、西河六郡时，曾特别指出：“土地沃少瘠多，是以伤于俭嗇。”可是在论述黄河以南的荥阳、梁郡等八郡和黄河以北的信都、清河等八郡时，都没有提到有关这方面的记载，至少可以说，这黄河南北的十六郡的土壤都不至于像河东、绛郡等六郡那样的瘠薄。

还应该指出：隋唐时期黄河下游南北各州郡能够成为富庶的农业地区，长期供应都城所需要的漕粮的原因，还应该得到黄河安澜的助力。黄河挟带泥沙东流，本是容易泛滥的。黄河每一泛滥，黄水所及之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都会受到难以估计的损失。黄水消退之后，泥沙随处堆积，甚至使农田无法耕耘。汉武帝时一次黄河决口，竟使有数百年繁荣的“天下之中”的定陶顿时萧条下去，再未能复原。西汉末年的一次决口，六十年中都未能堵塞得住，损失更为惨重。可是在那次决口堵塞以后，长期安流竟达到八百年之久^①。隋唐两代都在这安流时期之中。黄河能够安流，无溃决之虞，南北两侧的地区才能更多地发挥它们的富庶效益。

隋代历年短促，黄河一直安流。唐代也不是就无河患，但大多都限于较小的地区，并没有形成若何的影响。安史乱前的河患仅有十一次：溢于陕州（今河南陕县）的一次，在贞观十一年（637）^②，溢于河阳（今河南孟县）的三次，第一次在贞观十一年^③，第二次在高宗永淳二年（683）^④，第三次在武后长寿元年（692）

①谭其骧先生《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刊《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

②③《旧唐书》37《五行志》。

④《旧唐书》5《高宗纪下》。

①。陕州和河阳城都在黄河中游，距下游尚远。在黄河下游的有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县）一次，在玄宗开元十四年（726）②；济州（治所在今山东茌平县）一次，在玄宗天宝十三年（754）③；博州（治所在今山东聊城市）一次，在开元十年（722）④；齐州（治所在今山东济南市）一次，在高宗永徽六年（655）⑤；棣州（治所在今山东惠民县南）二次，第一次在武后长寿二年（693），第二次在开元十年⑥。还有一次在武后圣历二年（699）⑦，史籍仅记载黄河溢，未能确指所溢的是什么地方。这十一次溢决中，仅魏州和棣州所受的灾害最大。河决魏州那一次，怀（治所在今河南沁阳县）、卫（治所在今河南旧淇县）、郑（治所在今河南郑州市）、滑（治所在今河南滑县）、汴（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濮（治所在今山东鄄城县）诸州人不能安居，或构巢于树，或借身舟中，死者以千计⑧。长寿年间，河溢棣州那一次，曾坏民居二千余家⑨。灾害虽说不小，较之两汉时期，应该不是很大的，况且未久即已安澜，也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

由于黄河的溢决次数不多，也未形成严重的灾害和影响，因而它的南北两侧地区的其他水道就不至受到干扰，通济渠（即唐代的汴水）和永济渠能够开凿成功，而且长期畅通无阻，就是借

①⑦《新唐书》4《则天皇后纪》。

②⑧《新唐书》5《玄宗纪》。

③《元和郡县图志》10《郛州》。

④⑥⑨《新唐书》36《五行志三》。

⑤《新唐书》3《高宗纪》。

着这样有利的条件。尤其是太行山上流下的而现在归入海河水系诸水，也因黄河的安流而未受到影响。唐代河北道南部农田水利灌溉最为发达，就是这样的缘故，当时所凿的渠道陂池以相（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市）、赵（治所在今河北赵县）、冀（治所在今河北冀县）、镇（治所在今河北正定县）、瀛（治所在今河北河间县）五州为最多，都是安史之乱以前开凿的^①。这样可供灌溉的水利工程，河南道东部一些州中也都有所建树^②，不过没有河北道南部那样的繁多。

正是由于黄河下游南北各处有这样的自然条件，农业得到相当的发展，隋代及唐代前期所需要的漕粮，大部分就可以由此得到满足。

唐代后期，黄河的灾患显得较前减少。代宗大历十二年（777）^③和德宗建中元年（780）^④，曾经有两次河溢，都未有详细记载，不易知其发生事故的地方。另外有三次都发生在黄河中游：宪宗元和七年（812），河溢振武军，毁东受降城^⑤，次年，河溢天德军，其治所西受降城毁坏较多^⑥。昭宗大顺二年（891），河溢河阳^⑦。这三次出事地点皆距黄河下游悬远，可以置之不论。黄河下游这一时期的河患主要集中在滑州，也就是现在河南的滑县。宪宗元和八年（813）^⑧、文宗开成三年（838）^⑨和懿宗

①《新唐书》39《地理志三》。

②《新唐书》38《地理志二》。

③《新唐书》6《代宗纪》。

④《新唐书》7《德宗纪》。

⑤《旧唐书》15《宪宗纪》。

⑥《元和郡县图志》4《丰州》。

⑦《旧唐书》20上《昭宗纪》。

⑧《旧唐书》15《宪宗纪》。

⑨《新唐书》36《五行纪三》。

咸通中（约864至867）^①，先后发过三次，其中两次都促使当地改移了黄河的河道。昭宗景福二年（893），发生于棣州的河决，竟然形成了一次改道，是由棣州治所的厌次县境内向东北流去，冲出了一条新河道^②。这里距海已经很近，新河道也不是很长，灾患也不是太大，总算是一次改道，结束了八百年来黄河安流的时期。然而最使人注意的则是这一时期竟然发生了人为决河的事情。肃宗乾元二年（759），史思明侵河南，守将于长清界边家口决河东至禹城县^③。长清、禹城二县皆为齐州属县，今仍为山东长清县和禹城县。此次人工决河的结果和影响，除使禹城县城沦溺外，其他未见记载，后来到昭宗乾宁三年（896），河圯于滑州，朱全忠因决其堤，遂为二河，散漫千余里^④。后来到五代时，这种人工决河的事例竟然频繁出现。后梁末帝贞明四年（918），谢彦章攻杨刘，因决河水，弥漫数里，以限晋兵^⑤。后唐庄宗同光元年（923），梁主命于滑州决河，东注曹、濮及郛以限唐兵^⑥。黄河安流的有利因素，至此已难于保持。

应该说这种有利的因素在唐代后期仍未消失。安史之乱发生后，黄河下游的南北两方都未能再充分利用这种有利的因素，特别是太行山东的河北道南部更是如此。唐代前期，如前所述，这里的农田水利事业卓有成效，到了安史乱后，就未见到有若何建树。唐代亡后，历五代和北宋，黄河的溃决泛滥不断发生，黄河

①《旧唐书》172《萧傲传》。

②《太平寰宇记》64《滨州》。按：滨州置于后周时，割棣州的渤海、蒲台二县往属。

③《太平寰宇记》19《齐州》。

④《新唐书》36《五行志三》。

⑤《资治通鉴》270《后梁纪五》。

⑥《资治通鉴》272《后唐纪一》。

下游南北各地，就一直显得萧条，和隋代及唐代前期就迥然不同了。

三 长江下游太湖区域农田水利的发达

长江流域有三个富庶的农业地区，由上而下是成都平原和洞庭湖周围以及长江下游太湖区域，成都平原的富庶远在秦汉时期即已有名于当世。自李冰开凿离堆，避沱水之害，穿二江行成都之中，那里的富庶农业地区就已基本形成，而且以后也没有很大的变化。洞庭湖周围和长江下游太湖地区虽然在春秋时期，已经建立过楚国和吴国，然而更为世人所重的，则在南北朝时期。沈约著《宋书》，对此曾有过评论。据之说：“江南之为国盛矣。虽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于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域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①可是到了隋唐时期，尤其是到了唐代后期，长江下游太湖地区却成了全国少有的富庶地区，也是王朝财赋主要取给的地方，深受朝野所重视，故论者亦多。韩愈就曾经说过：“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②，杜牧也曾说过：“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③甚至唐宪宗上尊号时所颁下的赦书中更公然说：“天宝以后，戎事方殷，两河宿兵，户赋不入，军国费用，取资江淮。”^④元和时宰相李吉甫曾撰著《元和国计

①《宋书》54《孔季恭等传》。

②《韩昌黎集》19《送陆歙州诗序》。

③《全唐文》660，杜牧《上宰相求杭州启》。

④《全唐文》63《宪宗元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尊号赦》。

簿》，就已经指出当时总计天下方镇凡四十八道，共管州府二百九十五。其中有不少的方镇不申报户口，不缴纳贡赋。王朝每岁赋入所倚靠的，只是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合四十九州^①。这就是所谓的东南八道。这八道的治所依次相当于现在的浙江绍兴市、江苏镇江市、安徽宣城县、江苏扬州市、江西南昌市、湖北鄂城市、福建福州市、湖南长沙市。也就是说，淮水以南，南岭之北，西至今湖南西部，都包括在内，虽只有四十九州，地区却是相当广大的。

代宗时，刘晏遗当时宰相元载书，曾经说过：“潭、桂、衡阳，必多积谷”，他还计划“漕引潇湘，洞庭”，以济长安^②。这是指的湘、漓诸水流域，兼有洞庭湖周围各地。洞庭湖周围本来也是一个富庶地区，可是到宪宗元和时，洞庭湖西北却隶属荆南节度使，而荆南就不在东南八道之中。洞庭湖周围这时都未能发挥其所具有的力量，其他各道也就难得一律。因而唐代后期繁重的王朝财政负担，还是落在长江下游太湖地区，正是当时所说的江南或江淮各地。

长江下游太湖地区之所以能够成为富庶的地区，负担当时王朝岁赋的绝大部分，是由于当地自然条件的优越。战国时期，这里的土壤于全国各州中居于下下等^③，这应是那时的人没有很好的利用和改造，因而产生的错觉。经过其后较为长久的时期，它的优越性才逐渐显露出来，前引沈约在《宋书》中的议论，就可看到一斑。在南北朝时，这里的膏腴上地的价值已经超过了秦汉时期关中的沃壤。就是后来到北宋时，范仲淹还曾称道过：“苏、

①《旧唐书》14《宪宗纪》。

②《旧唐书》123《刘晏传》

③《尚书·禹贡》。